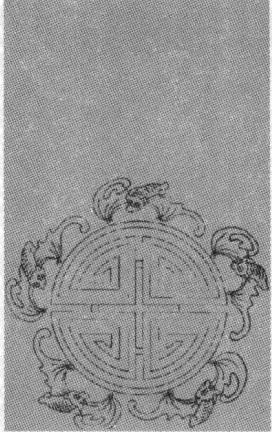


王慧荣 \ 著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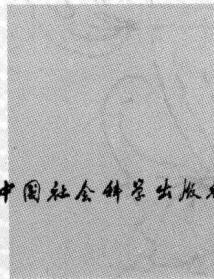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慧荣 \ 著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王慧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 (2008.3重印)

ISBN 978 - 7 - 5004 - 6782 - 3

I. 近… II. 王… III. 妇女教育－研究－日本－近代
IV. 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2209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张兰芳

责任校对 张 青

封面设计 典雅设计

版式设计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贤妻良母——良妻贤母观 对中国的“逆输入”

——代序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完善的近代教育体系及迅速提高的入学率；一方面是保守的教育内容。这一矛盾现象在女子教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王慧荣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一书，立足于揭示这一矛盾，较为全面而客观地阐述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征。

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贯穿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全过程，作者指出，先进的教育体制与保守的教育内容并存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突出特征，其具体表现在“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中精华与糟粕同在。这些观点体现了作者的观察与思考，很有新意。

提到“良妻贤母”，人们自然会想到“贤妻良母”，前者是日本的提法，后者是中国的提法。两者既有联系，也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女性观。在本书中作者已经从近代女子教育理念的角度对日本的“良妻贤母”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此，仅就“良妻贤母”对中国的“逆输入”说几句。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份只是在家庭：未嫁为女，既嫁为妻，生子为母。男人社会希望女性成为好妻子与好母亲，故对妻职与母职的要求与规范也随之产生。早在

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贤母”、“良妻”等概念，比如：

故从母言之，之为贤母也。（《战国策·赵策》）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史记·魏世家》）

此后，在中国史籍中，常有贤母、良妻、贤内助、贤妇人之类的称呼出现。做一个贤妻与良母成为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她们会因此受到男权社会的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

封建礼教一直注重妇女的贤与良，“贤妻”与“良母”是社会与家庭对女性的最高要求。所谓贤妻，就是温柔驯服，克己事夫，恪守三从四德，自觉为丈夫奉献一切的女人。中国历代女训中有关事夫的训诫连篇累牍，而论其周详，莫过于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撰的《女论语·事夫章》：

将夫比天，其意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夫若出外，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蠹妇，全不忧心。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粗丝细葛，熨贴缝纫。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待殷勤。莫教饥渴，瘦脊苦辛。同甘共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瑟琴。

在该章之末，作者写道，“如此之女，贤德声闻”，大概可以理

解为如能达到上述要求，就可以称得上“贤妻”了。

所谓良母，如同《列女传》作者刘向所说：“行为仪表，言则中仪，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其德，致期功业。”^①这主要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既要求母亲做子女的处世楷模，又要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担。中国历史上几乎家喻户晓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苏母教子成人”的故事的主人公岳母、孟母、苏母就是良母的典型。

贤妻与良母虽然都是女性的行为准则，但严格说来，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贤妻，要求的是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束缚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的规范；良母则是站在家庭和社会的角度，要求妇女发挥作用的规范。可见，在封建伦理道德下，男人需要的贤妻与家庭和子女需要的良母是有矛盾的。贤妻是从属性的，而良母则是主导性的（尽管是在家庭这一有限的范围之内）。在父权家长制统治之下，由于人们对“三从四德”的过分强调，使女性在未嫁为女、既嫁为妻的过程中，已然被塑造成以服从为美德、迎合男人意愿、缺乏知识与教养的“淑女”、“贤妻”，从而影响到在成为母亲后“良母”作用的发挥。人们对女性角色更看重的是服属于男人的贤妻，其次才是作为子女师表的良母。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女教、女训书中要求女子如何事父母、事夫、事舅姑的规范远远多于如何做母亲的规范，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或曰“良妻”、“贤母”之类的提法，但是，一直缺乏对“贤妻”、“良母”的明确的界定或者较为系统的说明却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其原因在

^① 刘向：《汉书·列女传·母仪》。

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分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人们要求妇女的只有顺从。从秦汉时期就已出现的三从四德的规范，到历代女教书连篇累牍的倡导，女子良与贤的标准，似乎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服从。这也许可以用曹禺的名作《雷雨》中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繁漪吃药，繁漪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就是封建礼教对贤妻与良母最重要、也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而没有必要对妻职与母职的作用与重要性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贤妻与良母也只能是模模糊糊的概念。且作为妻子与母亲，不论多么“贤”与“良”，都与“学”无缘。诚如《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者陈东原所说的那样，“从前只有‘慈母’，哪有‘贤母’？有一二贤母，如欧母陶母之类，那也是入圣超凡一般，非一般妇女所可望其项背，试问不学无识的女子，怎么能画荻，怎么能和丸？从前‘良妻’的含义，哪有后世‘良妻’的含义丰富？中国从前妇女的标准，只有她做一个驯服的好媳妇，并不想要她做一个知情识义的贤妻！”^①

正因为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之类的提法，使许多国人认为“贤妻良母”是中国古来就有的概念，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误解。把“贤妻”与“良母”联系起来，形成“贤妻良母”这一特定概念实际上要比人们的想象晚得多，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在中国的许多辞书中均没有“贤妻良母”这一词条，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贤妻良母”并非古而有之的概念。对于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很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23页。

没想到，“贤妻良母”是首先由日本人作为女子教育理念提出来，并由日本“逆输入”到中国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仅几十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为东方强国，过去曾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突然间令中国人刮目相看。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学习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自19世纪后期起，形成了中国人赴日考察、留学的热潮，其中不乏求知若渴的女学生。据说仅在下田歌子（1854—1936）创办的以培养良妻贤母为宗旨的实践女学校（1899年设立，近实践女子大学前身），从1901年开始的14年间就接收了包括秋瑾在内的二百数十名中国女留学生。^①当时，“良妻贤母”或“贤母良妻”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相当流行的时髦语言，培养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也颇有成效。“贤妻良母”或“良妻贤母”的口号正是这个时期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日本学者濑地山角认为，在中国，“贤妻良母”或“良妻贤母”一词的最早出现是于1905年《顺天时报》刊登的《论女子教育为兴国之本》一文中。濑地山角还指出，由于《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创办的报纸，所以中国出现贤妻良母的提法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②但是，据调查，1904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载的丁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说》与该杂志同年第12期刊载的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的演说中，都使用了贤妻良母一词。^③

资料记载表明，中国开始使用“贤妻良母”或“贤母良

^① 濑地山角：《东亚的良妻贤母主义》，载东大中国学会《中国——社会与文化》第4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281页。

^② 濑地山角：《东亚的父权家长制——性别的比较社会学》，劲草书房1997年版，第133页。

^③ 姚毅：《中国的贤妻良母言说与女性观的形成》，载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论集中国女性史》，吉川弘文馆1999年版，第117页。

“妻”的概念，不论是始于1904年还是1905年，都是与日本的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初就有人指出，“贤母良妻之主义自日本传染而来”，^① 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高素素的署名文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其中提到，“良妻贤母之说，盛唱于日本，吾国近日亦稍稍有其趋势”。^② 鲁迅先生在1925年所写的《坟·寡妇主义》一文中也曾谈到贤妻良母主义与日本的渊源：

他（指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廉——作者注）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中国贤妻良母观念的产生正是一个文化“逆输入”的过程：中国儒家规范妇女的“良妻”、“贤母”概念在对日本产生影响之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上升为具有理性思考的“主义”，成为近代社会的妇女规范，然后又在近代以来学习日本的潮流中影响到中国。

但是，在近代中国，贤母良妻主义也好，贤妻良母主义也好，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成为女子教育的代名词，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给两国妇女带来了不同命运，也对妇女的贤

^①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女报》1909年第2期，载张树、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82页。

^② 《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

良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近代国家要求的女性形象已经不仅是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其是否“良”与“贤”，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有知识、有文化，是否有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虽然良妻贤母论的提出是以家庭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职业”仅仅是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而已，但是，这些都被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成濑仁藏提出，要把“作为人的教育”、“作为女人的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当作女子教育的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尽职的女人、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国民，这三者是良妻贤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日本的良妻贤母论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因而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不仅有一大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女教育家，本书中列举了下田歌子、跡见花蹊、鳩山春子等典型人物），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女子教育能够快速普及并发展。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的良妻贤母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深感力量单薄，于是想到发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们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出发点，争取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女子教育。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做一个有文化的贤妻良母更

为迫切和实际。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像秋瑾那样的反封建的进步女士，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不能不放弃做贤妻良母而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富裕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也不约而同地鄙视并拒绝贤妻良母的角色，进入到要求妇女解放和女子参政的队伍中来。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追求解放的女性与贤妻良母观念的对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女革命家，论其数量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为了妇女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这些本来有可能是贤妻良母的出色女性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至于广大生活贫困、无法入学的劳动妇女，知识和学问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很难成为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广大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被压迫与被奴役的社会现实一方面造就出远远多于日本的女革命家，另一方面却在女子教育普及上大大逊于日本。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心理定式：贤妻良母与受教育、有知识并无直接联系；贤妻良母与女性的事业是对立的，一个女人，要么离开家庭搞事业，要么守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二者难以两全。如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在 1936 年写的《婆婆话》一文中谈娶妻标准时写道：

要娶，就娶个能做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

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

老舍的一席话实际上反映出人们不能把贤妻良母与有知识统一起来，虽然已事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看来这番话仍然有一定代表性。

本书作者王慧荣是一位非常刻苦、勤奋、好学的青年学者，《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的出版是她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当然，作为新人新作，本书尚有不成熟之处，尤其是对大正时代以来的论述显得较为薄弱。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开阔视野，让研究不断深入。

李卓

2007年5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绪 章	(1)
一、选题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5)
三、方法及结构	(14)
四、创新与不足	(17)
第一章 前近代女子教育概观	(21)
第一节 古代贵族的女才教育	(21)
一、亦诗亦琴的女才教育	(22)
二、女才教育的功利色彩	(28)
第二节 中世武家的女德教育	(32)
一、重女才向重女德的转变	(32)
二、中世女训的产生及内容	(35)
三、女才教育仍占一席之地	(37)
第三节 近世社会的女子教育	(39)
一、涵养妇道的女德教育	(39)
二、开启女智的庶民教育	(45)
三、培养特性的女红教育	(49)
四、近世女子教育的影响	(52)
第二章 欧式女子教育的兴起	(57)
第一节 欧美女子教育思想的传入	(57)
一、欧美女子教育相关资料的翻译	(57)

二、外国专家对女子教育事业的推动	(61)
三、启蒙思想家对女子教育的倡导	(64)
第二节 欧式女子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71)
一、《学制》与女子初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71)
二、女子初等教育机构的建设	(82)
三、男女共学制的贯彻实施	(88)
第三节 鸠山春子——欧式女性形象的典范	(94)
一、鸠山春子其人	(95)
二、创办共立女子学园	(98)
第三章 儒教保守女子教育的复活	(101)
第一节 女子教育体制的调整	(101)
一、男女别学制的建立	(101)
二、道德修身课的加强	(105)
三、女子裁缝课的特设	(110)
四、调整期的教育现状	(114)
第二节 儒教保守女子教育思想的抬头	(117)
一、复古派势力对儒家传统妇道的鼓吹	(117)
二、开明派人士女子教育主张的边缘化	(126)
三、教育敕语：女子道德教育的总方针	(132)
第三节 跡见花蹊——儒教保守女子教育的固 守者	(137)
一、跡见花蹊其人	(137)
二、创办跡见女子学校	(139)
第四章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确立	(143)
第一节 女子教育体制的扩充	(143)
一、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	(143)
二、女子中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149)

三、高等女子学校的发展	(152)
第二节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形成	(157)
一、女子教育观中的国家主义	(157)
二、高等女子学校的办学宗旨	(160)
三、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实施	(164)
第三节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特点	(168)
一、强调传统妇道的涵养	(169)
二、兼顾知识技能的培养	(172)
三、注重国家观念的灌输	(176)
四、良妻贤母主义之评价	(178)
第四节 下田歌子——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实践者	(182)
一、下田歌子其人	(182)
二、创办实践女子学校	(184)
三、招收中国女留学生	(188)
第五章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变异	(191)
第一节 一战后国家主义女子教育的强化	(191)
一、自由教育的兴起与衰退	(191)
二、国体观念与妇德涵养并重	(195)
三、女子教育体制的整顿与发展	(198)
第二节 羽仁元子——自由教育的倡导者	(207)
一、羽仁元子其人	(207)
二、创办自由学园	(209)
第三节 战时体制下的军国主义女子教育	(214)
一、贤良标准的军国色彩	(214)
二、学校教育的皇国民化	(217)
三、军国主义的家庭教育	(224)

四、妇女团体与社会教育	(228)
终 章	(233)
一、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特点	(233)
二、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影响	(239)
三、反思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	(246)
四、关于贤妻良母观的思考	(254)
附 录	(260)
附录 1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年表	(260)
附录 2 近代日本小学入学率统计	(269)
附录 3 近代日本小学入学率变化曲线图 (1873—1945)	(272)
附录 4 近代日本官办高等女子学校统计	(273)
附录 5 《女大学》	(276)
参考文献	(281)
日文参考文献	(281)
中文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292)

绪 章

一、选题意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国家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曾经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瞩目的事情之一。本书之所以选择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知识水平，还对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推动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教育研究以及女性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对研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一定意义。明治维新后，由于文明开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日本认识到发展女子教育、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于是提出“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的口号，制定了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使“女子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从此拉开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的序幕。《学制》之后，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教育令》、《改正教育令》、《小学校令》等教育法令，不断对女子初等教育制度进行完善，最终确立了六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又相继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规定》、《高等女子学校令》等教育法规，建立了女子中等教育制度。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近